

业、地方政府、社会、文化的有机互动产物,过去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过分依赖政府的行政手段,忽视了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应该将人口调控与区域功能定位、产业布局结合起来,采用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多方参与的调控方式,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和合理布局。例如,影响人口集聚与扩散的主要因素除了产业、经济因素外,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就可以通过教育、医疗资源的疏散来调节人口密度与布局。

第四,从人口疏散角度看应疏散北京的部分首都功能。为了疏散人口,北京政府四套班子将在2017年年底搬到通州,预计将带动40万人口从城区向外疏散。与2000多万的人口总数相比,40万人口的比例太小。此外,北京市政府机构与北京市民工作生活息息相关,搬到通州后可能会带来市民更多的交通行为,从而加剧交通拥堵和尾气污染。从其他国家迁都的经验来看,当首都因人口过度集中罹患“大城市病”时往往应疏散首都部分功能,例如韩国首尔就是将16个政府部门和20个附属机关搬走。因此,从长期来看,要疏散北京中心城区人口还应该疏散北京的部分首都功能。

第五,从人力资本角度看要挖掘京津冀吸纳外来人口的潜力。2015年,上海的常住人口总数下降

10.41万,外来人口总数下降14.77万,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信号。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7%的经济增长率至少有2%是靠外来人口拉动的,如果这些大城市的人口总量和外来人口数量持续降低就是其经济衰退的信号,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大城市的生产和消费,从而加剧经济不景气。京津冀区域当前人口空间布局不均衡,北京人口总量已经达到环境承载量的极限,河北的中小城市却缺乏吸纳人口的能力,因此重构京津冀人口地理,挖掘京津冀吸纳外来人口尤其是优质人力资本的能力至关重要。

注 释:

①根据2015年河北和北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

②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4》。

③童玉芬、马艳林《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影响因素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④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2014年10月。

[基金项目]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重大研究项目“中外城市群比较研究对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启示研究”(课题编号ICS-2015-A-09)。

刘新静: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博士。

用城市的方式思考经济问题

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 城市科学研究院,上海 200240)

城市在天性上是最活跃的经济组织形式,但同时也是人类最重要的空间聚集形态,包含了远比经济生产更为复杂的内容、要素和过程。当今世界是城市世界,经济活动的城市化趋势进一步强化和突出,以至于我们很难离开城市谈论经济。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我们在今天和在中国探讨产业转型发展、经济结构治理和应对城市病等必须立足的大背景和大前提。

一、“就经济论经济”的局限和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在以GDP为指挥棒的发展模式

主导下,不少人已经习惯于把社会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发展,并由此导致了一种“就经济论经济”的思维定式。比如一谈经济发展就是“三产的占比或协调问题”,再不就是围绕着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做文章。而一旦把全部的目光和心思都用在“三次产业”或“三驾马车”上,就很难再看到空间、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其他要素的客观存在,也容易忽视经济生产活动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的交互作用关系,无法把握住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问题和未来的发展需要,而由此做出的各种预测、判断及制定的政策和设计的体制机制,也就容易“剑走偏锋”甚至是“以水救水,以火救火”。如近年来此起彼伏的“唱衰中国经

论”从一些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统计数据看,这些论调并非不可以“自圆其说”,但为什么此种预言会一次次“失败”就是因为他们基本上都属于“就经济论经济”。此外,也包括我国近年来推出的一些经济和金融刺激类政策举措,一般人看到的只是其并没有起到预期效果,也不乏各种“事后诸葛亮”式的批评和嘲讽。但他们却很少会考虑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这些经济和金融刺激政策,在本质上也都是典型的“就经济论经济”,也可以进一步说是“以西方经济理论救治中国经济现实”的结果。

在当下非常有必要讨论的是,“就经济论经济”还有一个不易发现的价值问题,就是固执地认为“市场是公平的乃至于是最公平的”。其实这一价值判断是根本靠不住的。原因很简单,“市场公平”本质上只是一种“丛林中的公平”,是一种基于“弱肉强食”和“强者通吃”的自然公平,而距离一个文明社会所需要的理性公平,距离中华先民提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诸如“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等,是完全不在一个文明和历史档次上的。如果仅仅把“市场公平”作为最高评价标准,那么人类就永远走不出它的“丛林”状态和“野蛮”时代,更不可能在“丛林”的原则和游戏规则中达到“道德的善”和“过上美好生活”。

城市是经济活动的中心,城市文明是经济建设的目的。有鉴于此,我们的经济研究,特别是在战略研究和宏观治理上,必须尽早从“就经济论经济”的思维定式中超越出来,逐渐学会并善于运用城市的方式去思考经济发展和治理问题,这一点应成为认识和探讨技术创新、经济转型和结构治理以及多手段并举预防和应对城市病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和价值共识。

二、如何用城市的方式思考经济问题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经济学的方式出发,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必然被描述为经济问题,同时也会在经济学的理论和范式中寻求理解一切问题的方法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工具。而所谓“城市的方式”,是一切从城市的观念、理论、规律和框架出发,去认识、分析、研究和把握经济活动和过程的基础性和系统性的方法论。至于这两种方法和框架哪一种更好,关键在于谁能更适合今天的世界和中国。与把一切都理解为经济现象和活动不同,一旦我们从城市的方式和框架出发,经济生产就不仅只是一个经济学的理论和实

践问题,而是和城市的其他要素如环境、政治、社会、文化等密切相关,在一些部门和领域甚至还会有“浓得化不开”的综合性问题。这个视角和方法的转换,不仅有助于我们摆脱“三次产业”、“三驾马车”等惯性思维,同时也有助于真正打开“就经济论经济”的狭隘的经济学视野和思路,使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基础的经济生产获得更复杂的“新大脑”和更上一层的“新境界”。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发展困局和经济治理难题,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经济发展孤军深入”并“与其他社会部门日益脱节”的结果和后遗症,如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因为忽略了经济生产与资源环境的平衡关系,社会贫困问题主要是忽略了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的协调关系,而日常世界中的各种社会病和文化病,其根源则在于忽略了经济建设与制度建设、人文建设的有机整体关系。就当今中国和全球的经济研究和经济治理而言,与经济生产活动最为密切并对其有直接和重大影响的空间、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要素,可以说已主要集聚在城市特别是现代化大都市中,它们相互缠绕在一起,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城市的形态、功能和存在方式。就此而言,我们必须从城市发展和治理的全局出发,摒弃和破除“就经济论经济”的观念和方法魔咒,努力确立一种以经济科学为主体、以城市科学为母体的经济发展和治理的新理论与新方法,为规范城市经济发展,协调城市经济与空间、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关系提供“内在的生产观念”和“外在的实践方式”。在此必须强调的是,如果人们在今天依然无视这些彼此相关、互为整体的关系和联系,依旧沉湎于各种“就经济论经济”的套路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经济治理药方中,那么可以预见,无论人们再怎么研究和探索,都不可能逃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铁律,更不用说实现“综合施策”和“标本兼治”的目的。

三、以城市生态圈构建引导我国经济治理

当今世界发展日趋复杂和动荡,环境问题、贫困问题、能源问题、金融问题、城市病问题、精神生态问题等层层累积、集中爆发,作为人类社会基本部门的经济生产领域,既是引发各种现实问题的主要背景和直接原因,同时自身也深受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影响和困扰。与此同时,旨在减缓和解除“经济基础”问题的经济治理和经济转型探索,在今天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和更加紧迫。对此特别要予以强调的是,在21世纪这个人类的都市时代,经济治理和

发展在本质上已彻底演化为一种“城市现象”或“城市问题”，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和引导我国经济发展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大背景。在城市框架下思考和探讨经济问题，目的是为经济科学构建一个理论与应用并重的生态圈，一方面，促使经济学发现真实的经济问题及社会根源，转变“就经济论经济”的学术范式并实现自身的基础理论创新，另一方面，是促进这门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学问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协调发展，集中各方面各领域的理论和思想资源，联合起来为城市人类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智慧和系统解决方案。

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是现在的经济学者不关心城市，恰恰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特别热衷于对城市问题发言和评价。但由于“就经济论经济”的局限，他们最喜欢的往往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认识、思考和判断城市问题”，结果也多半是把异常复杂的城市发展简化为一种经济生产过程及一种金融或市场行为，这就完全颠倒了“整体”和“部分”的逻辑序位和结构关系，也不可能找到真正的“病因”并开出切实有效的“药方”。要改变这种积习已久的思想和价值症状，需要深入探索“经济学”与“城市科学”、“中国经济治理”与“中国城市发展”的对话可能与沟通桥梁。对此我们认为初步可先从三方面展开探索。首先，需要认真系统地梳理一下经济学研究中已有的城市研究理论和方法，重点关注有哪些经济学原理和方法是适合于城市的，有哪些是不适合的乃至是相反的，在此基础上重建城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为经济学切入城市科学框架和城市发展领域清理一下“家底”和“本钱”；其次，要认真研究一下当今世界城市化进程，特别是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经济发展与治理会提出哪些新的要求，如城市环境方面的“去三高产业”问题，如消费生活方式方面的现代服务业问题，如城市文化建设提出的文化产业问题，如我国新型城镇化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问题，智慧城市提出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问题等，特别是要关注这些新问题会对经济科学提出哪些变革的要求和希望，而不是一味地用“经济学的尺子”去量裁、品头论足甚至是削足适履。再次，要好好研判一下经济发展与城市发展在战略目标上“接近”与“融合”的路径。城市的本质在于提供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任何一种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生产活动的最高理想和最后目的。但遗憾的是，一个时期以来，在以GDP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中，不仅经济的目的成为主宰环境生态、社会文化的唯一权威，同时这也将我国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为一种“经济型城市化”，结果是一方面恶性损耗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与环境条件，另一方面也严重污染了当代人的精神家园和内心世界，总起来说，这是由于我们的城市和经济都背弃了自己的“初心”，并因此而陷入了一种双输、多输乃至有可能全面溃败的结局。所以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中找回两者共同的“初心”，一方面，以此“最初一念”为基础，促进双方由对立和对抗实现相互“接近”和“融合”，另一方面，以城市为中心，为我国经济发展构建一个环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良性互动的生态圈，并努力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最高发展境界不断迈进。

四、以文化城市群新理念驱动区域经济转型发展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我国城市群建设基本面稳定、整体向好的大趋势正在形成，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比较突出的挑战和困难。以我国三大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为例，一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正从“各自为政”的历史走出，在破除行政壁垒、实现互联互通等方面，有些甚至走在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前面。在“十三五”时期，预计这种良好态势不会减弱。另一方面，集聚了成渝、长江中游和长三角三大国家城市群的长江经济带，由于“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思维异常明确，加上武汉刚刚晋升为八大国家中心城市，有助于结束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期以来的“群龙无首”的局面，所以其未来的发展也比较看好。而目前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具体说来，在“一路”方面，目前主要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海峡西岸、辽中南、北部湾等城市群，相互间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因此主要面临的是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的问题。在“一带”方面，从东向西依次排列着中原、关中平原、晋中、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城市群，它们的主要问题是应对城市衰败及为城市复兴创造条件，特别是如何应对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而导致的人才和人力资本外流以及人心涣散、人气低迷等突出问题。但无论是何者，它们在最深层涉及的都是创新发展问题。

在当代谈任何创新，都不可能脱离文化和价值问题。这是因为人是创新的根本，如果人没有积极主动性，人的思想和价值问题不解决，任何蓝图和设计都不可能落地，或者是一落地就扭曲变形得面目全非。

城市群作为海量人口的集聚形态,也同样遵循这一规律。正如我们多次强调,理想的城市群不是城市“扎堆”在一起制造出一大堆吓人的统计数据,而是一个在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整体上具有合理层级体系,在空间边界、资源配置、产业分工、人文交流等方面具有功能互补和良好协调机制的城市共同体。就此而言,推进城市群建设的重点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西方城市学家明确指出的在空间和人口等方面形成“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和分工协作机制”;二是很多人目前仍未意识到的城市群的“文化、生态和生活质量”功能,而实际上这才是更重要和直接决定着城市群建设目的和意义的根本性问题。受西方城市群理论和我国经济型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影响,当下人们主要把城市群规划等同于“经济”和“交通”建设。不仅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规划中,在其他各城市群也差不多都是如此。这种片面化和简单化的思路和倾向,是在当下急需引起重视并得到纠正的,否则将会在城市群之间形成更大规模的“同质竞争”和“结构趋同”,那不仅没有办法接受,也是更加难以治理的。

因此在“十三五”期间,我们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应当考虑以文化城市群作为重要的战略突破口,大力实施区域文化资源规划与保护开发战略,驱动和引领区域经济转型创新发展。同时建议在“十三五”时期,国家要有意识地选择若干个城市群作为文化城市

群规划建设试点,探索和改变以工业化、现代交通建设为主导的区域发展模式,重建和复兴不同的区域文化传统,实现区域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主要设想是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首次提出的“人文城市”战略框架下,充分利用我国不同区域深厚丰富的文化资源,规划和建设以文化建设为生产生活方式,以市民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为评价尺度的文化型城市群,突出文化、生态和生活质量在城镇化中的主题和导向作用,探索解决过分强调人口、经济和交通而导致的愈演愈烈的“城市病”,带动城市群和区域发展进入以文化发展为主题,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政治建设为目标的良性循环阶段。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3] 刘士林.都市文化原理[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
- [4] 刘士林.关于我国城市群规划建设的若干重要问题[J].江苏社会科学,2015(5):30-38.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旭东;校对:鲁雪峰